

读书养育一座城市



□黄万华

一年前,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将第一个“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”的荣誉授予中国深圳,一座只有30多年历史的年轻城市。去年11月,我再次来到深圳,在花莲山畔的深圳书城久久驻足。这里是深圳最好的中心城区,寸地寸金,却是深圳的文化院落。进入上海都没有如此大的书城,每一步你都会感受到读书沉积的深厚。

我去过全国所有大城市的书店,都未见过如深圳书城售书分类之细。书城毗邻深圳图书馆,书的分类比图书馆还细,一目了然,找起来十分方便。每个书架前面,都有驻足翻阅、席地而读的读者,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场景,足见深圳人阅读视野之开阔。

书香从书城的书架上弥漫开来,滋润着深圳人的心灵。从2008年第9届深圳读书节起,“深圳晚8点”的节目,天天在书城举行,全年无休,风雨无阻,延展着深圳人的生活。去年12月,除了有姜夔成、石维坚、达式常等众多演员参与的

“经典诗文朗诵会”,还有深圳学人“南书房夜话”、“风雅颂原创诗经主题音乐会”、“2014深圳童话节”等活动,让人感悟到深圳持久活力的源泉所在。

深圳已举办了4000余项阅读活动,读书不再是文人雅士之事,而是众多市民的日常享受,是深圳人重要的“文化权利”。想想全国各地城市,书店消失,读书冷清,深圳人的幸福令人羡慕,发人深思。

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时代的阅读,其深度和广度深刻反映出时代思想的深度、文化传承的广度,也包含着时代的处境、走向等诸多问题。当下时代的阅读,就在于“读书养育城市”。眼下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加速,但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,当越来越多的人涌进城市时,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样的城市呢?

俄国民众自豪于圣彼得堡(列宁格勒),是因为“随着圣彼得堡的出现,俄罗斯文学诞生了”,尽管它历经变化,甚至改名,但“精神上,这里依然是首都,它与莫斯科的关系,就如同佛罗伦萨与罗马,或者波士顿与华盛顿的关系”。

民众读书生活对于一代人、一座城市久远的塑造作用,在当前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,但中国还没有一座像圣彼得堡、佛罗伦萨、波士顿那样的“精神首都”,文化故乡(而这恰恰是城市化转型建设中最重要软实力)。相反,城市的文化记忆在退化,阅读环境在恶化,各个城市的发展千人一面,生机萎缩。

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悠久深厚,但日常的读书生活并不丰富。2011年世界各国人均阅读量中,以色列人为64本,俄国人为55本,美国接近50本,而中国不足5本。近百年来,当下可能是读书最好的时期,也是读书最难的时期。“家庭摆设

的中心往往是大屏幕的电视机,书店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买得最多的是教辅书籍”,是当下中国大陆日常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两大现象。娱乐性、实用性、欲望性等主宰着人们的生活,其实反映出人们生活的内在困境。

“‘70后’每日往返于各大城市的馆堂会所觥筹交错,无暇读书;‘80后’每日生活在钢筋混凝土铸造的铜墙铁壁中无法抽身,无力读书;‘90后’每日按照开机登录QQ、微博的流水程序日渐麻木,无心读书”,这些写照未必不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蔓延成更广泛、更深度的现实。

冰岛是个民众幸福度很高的国家,但冰岛人的幸福感不仅来自贫富均匀、社会安全,更来自良好的阅读环境和阅读习惯。书籍,尤其是文学书籍不会死亡,也让人“不会死亡”,更让一座城充满生机。而生活在一座无暇、无力、无心读书的城市里,是不会有多少幸福感的。

眼下,我们也在创建各种城市:文明城、卫生城、森林城……都有必要。但读书城,更长远,更根本,更必要,也更需要创意和踏实持久的努力。

民众读书,无涉GDP一类政绩,也似乎无关衣食住行等民生迫切问题,但在深圳,政府会拿出最好的地块建书城,办书市,深圳众多有识之士会持之以恒,润物无声地展开各种读书活动。一座城市将民众读书置于重要地位,自然说明这座城市官民非急功近利,长远根本所在,浮躁之气无藏身之地,上下之间的共识会更多形成,各种创造性思维会源源不断而生。读书城会带来文明城、卫生城、经济强城等等,当不是谰言虚语。

(作者为山东大学教授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长)



碎碎念

孩子的起跑线应是能力线

□徐振宽

几月前,浏览了温儒敏教授有关“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的文章,就此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。

“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呢?我认为它对,也不对,就如同一个字有多种解释,在这一语境中是这个意思,放到另一语境中就可能是另一个意思。所以,这句话本身没有错,错的是我们站在了不正确的角度上去评判。

我们每个人都怕输,都想赢,这不过是人之本性。也许就是这一“输”障目,使我们看不见真正的泰山。我想着重阐释的是“起跑线”这三个字。

人生之路存不存在起跑线?我的答案是肯定的。不过,所谓的“起跑线”是一条什么线?分数线?素质线?我认为应是一条能力线。

认为起跑线是分数线的人最多,这也许就是当下教育为什么呈现出一片乱象的根源所在。学习就是为了取得高分,取得了高分,就可以升重点初中、重点高中、名牌大学,就可以找到好工作——孩子的一生就这样被父辈们

看似合理地安排好了。

所以,我坚定地反对“不要让孩子输在分数起跑线上”这一做法。

认为起跑线是素质线的人虽不是最多,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。随着人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,受各种媒体的明导暗引,再加上培训机构营造出的浓厚氛围,不少家长带着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到各种才艺培训的大军中。学钢琴、学书法、学画画,不但周六周日排得满满当当,甚至每晚都没有空闲。于是,一些专家大声疾呼“反对”!那让我们的孩子干什么呢?有的专家脱口而出:“玩是孩子的天性!”可是,现在的孩子能玩什么呢?周围有足够的场地及体育设施吗?有科技馆、文化馆吗?

孩子可不可以参加一些兴趣班?我是持肯定态度的,关键是孩子要真感兴趣。以音乐为例,我认为我们培训力度还不够,大众的音乐素养还较低,整个社会的音乐氛围还不浓。同时,现有的培训机构水平还有待提高,大多数培训机构仅仅停留在考级这一较低层次上,有待加入音乐欣赏、指挥和创作等内容。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才真正懂音乐,而不是一个个只会演奏的工匠。

意识到起跑线是能力线的人估计很少。何谓“能力教育”?能力教育是一种以立足于孩子自身为出发点,着重于对孩子应具备的能力的全面开发、培养与提高,引导孩子开启成功人生的教育。

温儒敏教授在文中提出:之所以出现千万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,并纷纷加入到各式各样的培训大军,是因为“集体无意识”。对这一点,我是赞同的。但温教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胎教说:“不少年轻母亲,刚怀上孩子几个月,就开始上各种学习班,听音乐、读诗。我很怀疑,因为这不符合教育规律。”这一点我是不赞同的。反对胎教,就要摆出证据,让人信服,如果只是因为怀疑就反对,是站不住脚的。温教授向科学家发出倡议,我却认为这是教育家分内的事:搞个跟踪调查研究不可以吗?历史上的许多音乐天才、绘画天才大多出自音乐世家、绘画世家,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吗?父母在要孩子前做好身心准备,在怀孕期间听听音乐、读读诗词,愉悦身心有何不可?

教育孩子不要迷信任何人,盲从任何人,只要自己肯动脑,就相信自己吧!

名家言

我与梁启超家人的邻里往事

□刘树林

建国初期,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说:“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,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,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。”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。

1940年,我出生在芙蓉街50号,全家租了房东张允恒家的四合院。站在院落后门南瞰王府池子,北眺起凤桥,“家家泉水,户户垂杨”正是对这条老街的真实写照。直至建国后父亲到了省府工作,我家搬到了省府第四宿舍居住。在省直机关工作的梁思宁一家也住那里,我们两家关系甚好,我母亲又善于搞好邻里关系,两个孩子都比较多,经常在一起玩耍。听她家孩子说,小学历史课本上的那张光头像是他的姥爷,我们小孩子怎么也不相信,认为是瞎说开玩笑,课本上还能有你的姥爷!非要弄个明白不行,就去问了大人,果然是真的。梁思宁家有一保姆,除了看管孩子,还照顾她的婆婆直至去世,日常操持着全部家务,孩子们很听保姆的话,孩子们称呼她“娘娘”。

1959年我由济南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,经常去西单手帕胡同33号拜望梁启超夫人王桂荃。老人家思想进步,家里订了《人民日报》,每天看书看报,思维敏捷。她经常勉励我要学好专业技术,刚踏入社会一定要好好工作,多向老师傅学习;工作中要勤快,生活上要简朴,团结好同事,与亲友善相处。对我讲的都是很实在的话。她家的保姆说王桂荃老人掌握着家庭经济,许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,腿脚灵活,身体挺好,精神矍铄!还经常去附近的西单看戏看电影,家里还有黑白电视机,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。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:她让我去天津时看看她捐献给国家的房屋是否安好。

去她家的次数多了,就变得熟悉而亲切,交流也多了起来。家里的墙上挂的大幅照片是其小儿子梁思礼,当时是“两杠四星”大校军衔,建国后由美国回国,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。家人出出进进,都是高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,他们待人彬彬有礼,对当时二十出头的我热情打招呼,让我受宠若惊!每次去她家,老人家都要留我吃饭。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紧缺,油肉凭票供应,留下吃饭多不好意思!但老人家再三留我,她是四川人,还专门嘱咐保姆做菜不要放辣椒。她们是用“文明碗”,时值小伙的我,用惯了大碗,嫌碗太小,又不好意思一碗接一碗地吃。但老人家说小伙子饭量大,一定要吃饱!我留下的粮票老人家坚决不收。

每到回济南过春节之前,我都要去老人家里取些东西捎带给她女儿梁思宁。我回北京时再给老人家带点家乡特产,以表谢意。1963年,我回济南过春节,老人家捐给女儿一百元钱,另外给我十元带回家过春节,就这样连续四个春节直到1966年共资助了我四十元,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。1963年6月,正值我回济南休探亲假,恰巧老人家由北京到济南女儿梁思宁家,还到了住同院的我家探视,并带来一些北京特产。这次济南之行,老人家还去游览了泰山,这也是她最后一次来济南。

1965年,梁思宁的丈夫章柯同志担任山东省科委领导,全家搬至经四纬六路省科委所在地,从此我们两家就分开了,但是两家人仍然保持着密切关系。我家人口多生活吃紧时,我弟弟就到梁思宁家借钱。梁思宁在借钱之外还会给两毛钱乘公交车的路费,但弟弟为省下两角钱总是徒步回家。当我家去还钱时,梁思宁说:“不用急!”章柯说:“不能要利息!”

次年,我父亲调至山东煤矿学院(现山东科技大学)工作,我家搬至科大家属宿舍。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,全国上下批斗“当权派”,章柯、梁思宁夫妇也未能逃过一劫!他们家雇保姆也成为一大“罪状”,在这紧急关头,他们家保姆跑到我家避难。后来老保姆生病住院,梁思宁及其子女每天守护在病房,喂水喂饭,洗脸擦澡。保姆病故后,他们作为亲人料理后事,兑现了梁思宁将保姆养老送终的承诺。

1967年,“文革”正值高潮,我在北京去看望梁启超的夫人王桂荃,家里被抄,完全破败。老人躺在院落门房小黑屋里一块木板上,地上放一个热水瓶,凳子上放一个干巴烧饼,老人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:“你快走!红卫兵来了!”我含泪告别,目睹了老人家弥留之际的悲惨处境!次年老人离世,终年八十二岁。